

大學服務中心：世界一流的中國研究基地

關信基、熊景明

香港中文大學的圖書館側門旁，一塊不起眼的銅牌上寫着：大學服務中心。不知底蘊的人會以為這是提供辦公室輔助性服務的部門。而對研究中國大陸的學者，尤其是西方學者而言，這一個香港的研究基地曾是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當代中國研究的綠洲。圈內人少有不聞其盛名的。據八十年代初一份不完全的統計，利用該中心做研究而完成的著作超過二百本，其中不少都成爲行內人必讀的書。

中心於一九六三年在香港設立，其實標誌着西方當代中國研究的一個新時代之開始。在五十年代中美關係因爲美國國內麥卡錫的肅共活動及隨後雙方捲入韓戰而嚴重惡化，使得學術界的中國研究處

於低潮。對研究紅色中國感興趣的人，甚至可能犯同情或串謀共產黨之嫌，遭聯邦調查局調查。直到五十年代末，一批富有遠見的學者認爲不應漠視這一泱泱大國的存在，將之排斥於國際家庭之外。於是決心衝破禁令，開創中國研究之新局面。

當時進入中國去做研究絕無可能，故在香港設立原野站便是最佳選擇。經學者們多番努力，終獲私人基金會贊助在香港設立了這個大學服務中心。

當今中國研究領域內享有盛名的學者，諸如 Lucian Pye, Michael Oksenberg, Ezra Vogel 以及更年青的一代著名學者 Andrew Nathan, Martin Whyte, Suzan Pepper, Andrew Walder 等人，都曾

在中心原址——亞皆老街那兩層樓房裡渡過幾度炎夏，利用中心及當時香港友聯研究所的資料做分析，訪問香港的大陸移民。直到七十年代大陸開放之前，通常都有來自世界各國的數十名學者同時在此做研究。每天中午的聚餐都幾乎是一次輕鬆的中國問題討論會。趣味相投的學者朝夕共處，切磋爭論，引發的靈感不亞於讀書所得。另一方面由五湖四海會聚於此的中國學者彼此結識，漸漸形成一個中國研究的國際學術圈，許多人的密切聯繫一直維持至今。

有人曾說西方研究蘇聯的學者大都因為對這個國家及制度反感而去研究它；相反地，從事中國研究者大多則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或歷史所吸引而進入這一領域。目睹前來大學服務中心的學者們的熱忱與關注，令人相信此說或有道理。從清晨到夜晚十時中心大門上鎖前，都有人在埋頭工作。爲了省錢，學者通常在九龍普通民居租房住，這些諳說國語的「鬼佬」不免招來街坊詭異的眼光。

靠一個設在中國大門口的研究基地，透過分析

門縫中轉告的消息，依賴大量細緻的移民訪問，一些重要學術成果七十、八十年代初相繼面世，有助於外界了解中國的真相；大學服務中心功不可沒。

除了學術層面的意義，加深對中國的了解自然有助於世界各國決定其對華政策。例如曾在中心做研究的年青學者中不乏繼而從政者，有的當上本國的中國事務顧問，有的做了外交官，像澳大利亞駐北京首任大使 Stephen Fitzgerald，本港總督衛奕信爵士，當年也會在中心做研究。

七十年代末期，中國的大門漸漸打開，學者們急不可待地湧進去，想親自看看這個研究已久的對象。到八十年代初，遠到大陸去做實地調查、與當地學者合作研究等等夢想都可半真半假地實現。大學服務中心已不再是中國研究者的必到之地。當時的中心主任鐸華(John Dolin)先生頗有見地的着力加強中心另一項優勢——資料收集。憑有限的經費，靠工作人員的執着與努力，終於使中心變成世界上最完善、藏量最豐的當代中國研究資料庫之一。

在租金日益昂貴的香港，依靠私人基金資助維持一個不謀利的學術機構實在不容易。中心的國際顧問委員會及自七十年代初便負責經營中心的機構——美國學者聯合會委員會，每年都為籌錢而傷透腦筋。雖然多年來曾獲不少基金會，例如卡耐基、福特、米蘭、魯斯、全國人文基金等慷慨解囊，但到了中心的角色轉變，不再充當中國研究唯一的遠東大本營之後，顯然說服基金會出錢的理由已不再足夠。到八八年春，該委員會終於下決心將中心，移交給某一間美國或香港的學術機構管理經營。

大多數西方學者都認為留在香港是大學服務中心的最佳出路，香港現時已不是中國研究的終點站，卻仍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中途站。而對本港學者而言，擁有一個收藏如此豐富的資料中心，毫無疑問將大大方便並可能增強本地的中國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的建校宗旨之一便是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對中國研究的興趣向來很濃。學校中不少有識之士皆以為爭取接管中心是有益於大學及有益

於香港的事。到八八年中，談判成功，中心遷入大學校園，經過一年的緊張籌備，於八九年六月中重新開放。正好趕上迎接當時因天安門事件而紛紛離開大陸的海外學者。

今年二月，中心的國際顧問委員會在中大舉行管理經營權移交後的第三次年會。眾人對中心遷入大學後的發展由衷地表示滿意，一致通過支持將中心的所有權也移交香港中文大學，中心將在香港永久安頓下來。

到中國去作研究的海外學者為了收集資料，得耐心地適應內地的辦事方式和忍受種種不便與限制。有些學者在歸國途中順便來中心看看，往往驚奇地發現，「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殊不知在香港竟有如此完整齊全，又十分便於使用的收藏。就四九年後中國資料的分析研究而言，海內外恐怕不容易找到比大學服務中心更理想的地方了，例如中心藏有一套完整的大陸中央及地方報紙，人民日報從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創刊號始，其他各

省大報都自五十年代初起。現在訂有的五百多份大陸報紙中，來自廣東省便有廿八份，上海廿七份，四川十份。這些都是做地區研究者難得的第一手資料。中心訂有一千二百多份雜誌，除了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各種期刊外，還搜羅了一些地方出版的刊物，這些刊物在中國以外的圖書館都不易找到。中心另一套重要的收藏便是八十年代中期以來各省的年鑑及各種統計資料。目前中心正設法收集近年出版殷實可靠的各縣縣誌。各國的中國研究學術期刊，英美編譯的大陸報刊廣播、英譯日刊、以及中文的研究論著，自然都在中心收藏的範圍之內。中心現有英文藏書五千多冊，中文藏書兩萬多冊。

到中心來做研究的海外學人，不須繳交任何費用，也不用作特別申請，中心還可協助他們辦理簽證，安排住宿及解決一些其他的問題。不過卻有一項不成文的慣例，就是使用中心的學者，會在中心舉辦的午餐研討會上主講。每月大約兩次此類研討會往往吸引到一批同行，引發有趣的討論。其次，

他們也會在完成的著作中鳴謝中心的服務。去年中心更得到美國學者聯合會委員會資助的一筆演講金，用以邀請知名學者來此作學術演講。這些卓有成就的教授大多數都曾在中心默默耕耘，而今追憶往事，都有一番早生華髮的感慨；同時，也都為中心找到理想的歸屬而感到欣慰。

置於中文大學這樣一個學術環境中，中心顯然可發揮更充分的作用，便於中大及其他大專院校師生使用。自去年起，除了海外及本港學者、研究生外，中心亦有限度地對本科生開放。另一方面，由於得到大學其他部門尤其是圖書館的支持，中心的運作和管理也得以改善。最令人欣慰的是經費有了保障。為生存而掙扎、到處求援的日子總算過去了。

反過來看，就要回歸中國的香港，實有必要加強對中國的認識。如果在這裏連一所像樣的中國資料圖書館也沒有，就很可悲了。香港的學術機構和政府都不曾刻意地去建立一個中國研究的基地，卻得到一個現成的中心，仿佛是天意。